

儒学与中国

李颖科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中国

李颢科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七二二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5.125 插页2 字数108千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7-5618-0186-8

B·9 定价：2.10元

引言

反思——纵向的回溯与横向的比较

纵然不是上天在冥冥之中所决定，也纵然不是命运之神有意按照两种不同的模式塑造出东方中华民族与西方其他民族。然而，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是两个属于不同类型的民族，这就是：在心理结构上，中国人保守、封闭，西方人豪迈、开放；在性格特征上，中国人内向、克制，西方人外向、狂放；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注重直观体验，西方人注重逻辑推理；在审美情趣上，中国人强调对内部世界的反省，西方人强调对外部世界的观照……

历史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每当人们打开璀璨光华的中国史册，往往会不时地发现一些离奇而又令人深思的现象。比如，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总是具有一种自发的心理上的隔阂与疏远，而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种隔阂与疏远却变得越发严重，以至到康熙中叶以后，中国人便把自己的大门反锁，杜绝耳目视听，生活在一个毫无外部世界信息的沉闷而闭塞的

国度里？为什么象林则徐这样目光敏锐的近代大思想家，在19世纪中叶，也仍然在倡言“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便能置英国于死地”的守旧之词？为什么连那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洋枪队长戈登也能说出这样一句令人痛心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①

为什么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既不象古代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那样外向、粗豪与狂放，也不象现代西方人那样追求个性的解放和欲望的满足，而总是固守忍让、克制这一拘谨唯诺的处世之道？为什么象苏轼这一被中国人视为北宋一代最为豪放的文人学士，尽管也曾用他的绝妙之笔挥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恢宏开阔、豪迈奔放得只有关西大汉才能唱得出的词，但他最后也还是免不了发一番“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哀叹？

为什么自古以来的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偏向于抽象化、条理化、层次化的思维习惯，而善于在特殊的、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为什么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带有很大程度的意会性和附会性，以致到近代中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大多数士大夫总是以意会附会的手法来实现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与理解的功能？比如，诸如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光学、医学等西方近代科学被他们附会到“术数”这一在中国用来表征占星、阴阳、灾异、八卦、相术、

^①戈登：《1863年12月12日给母亲的信》，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225页。

天文历算等方术之学的概念之中；西方大炮、战舰、火器、钟表、玻璃等资本主义工业技术被他们附会到“机巧”、“杂技”这些在中国用以表征工匠之学的概念里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甚至连鸦片战争这场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国际战争也被士大夫通过附会的手法归属于远古华夏族与夷狄之间的战争类型之中。

为什么中国古典艺术不象西方那样注重模拟的忠实与再现的可信，而强调的是情感心志的抒发和内在生命的表现？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保有一种抒情言志、温柔居中、以理节情的审美情趣？

.....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论是它的心理结构、性格特征，还是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除受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之外，都无一例外地要受制于一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换言之，一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必然通过其潜移默化的方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普遍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规范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这个民族某种共同的心理结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界，尽管除儒家思想以外，尚有外来的佛教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但是，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未能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之学。在中国，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以后，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封

建社会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大纲，居于绝对一统地位。人们不仅将“六经”崇为圣典，就连秦汉先儒对“六经”的传注也被奉若圭臬。沧桑变迁，尽管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儒学曾先后经受过东汉末年佛教输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和近代西方文化的挑战等数次较大的来自外部异源思想的冲击运动，然而，这些都未能动摇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社会官方之学的根基，它始终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别说在整个封建社会，甚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国粹派人物依然认为儒家思想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佳模式，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千百年来，一代复一代，一朝复一朝，封建统治阶级总是不断地以儒家思想为依据来建立有利于维护与巩固本阶级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而这一思想理论又渗透到封建文化的各个领域，渗透了整个社会心理。对每一个封建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在其一生中，接受最早和接受时间最长的也必然是儒家思想。正是立足于上述理由，只有把观察的着眼点放到儒家思想上，才能找到上面所提问题的确切答案。

概括地说，本书的主题是，儒家思想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内在根源，或者说是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本书立足于“积淀”的角度，从社会心理学、性格心理学、思维科学和美学等学科入手，通过纵向回溯与横向对比的手法，来考察儒家思想在铸就中国人心理结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的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结论是：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儒家学说中“从周”、“复礼”、“法先王”、“故旧皆好”的守旧观念形成中国人保

守、封闭的心理结构；儒家学说中那些“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和为贵”、“吾日三省吾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格言式的教诲和纲常名教的伦理观以及起性化伪的文化观，形成中国人内向、克制的性格特征；儒家学说中只重直观体验，而不重概念的明确定义和逻辑推理的思维倾向，形成中国人忽视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而注重直观、直觉体验的直觉思维方式；儒家学说中“比德”、“抒情言志”、“温柔居中”的审美指向，形成中国人“比兴”、“抒情言志”和“以理节情”的审美情趣。

历史总归是历史，逝去的東西將永遠不會再現于世。然而，結合現實對歷史的探沉反思——縱向的回溯與橫向的比較，卻永遠是每一個走向未來的人富於激情且無法抑制的思維追求。筆者正是基於當今社會改革的使命感，才萌發了要以今天的觀念、今天的情感，也就是說，以當今時代作為反思的參照系，來寫作本書。本書的目的在于尋覓今天改革浪潮中那些不時鳴響的不協調音和那些隱隱約約但又極其頑強的惰性力的總根源。筆者對於那種為了歷史而去研究歷史，為了反思而去反思的作法，缺乏興趣。

朋友們，不知你是否對本書的探討富有趣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讓我們共同置身於中國歷史的長河之中，作一次探索性的嘗試又如何呢？

第一章

儒学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

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是指该民族在主体方面的内在规定性，即历史中“保有的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①。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它始终制约着一个民族之为这个民族的内在心态、精神素质……

一、一个奇怪的民族与其奇怪的根由

——造就中国人心理结构的 诸种因素的综合考察

I

每当人们置身于波涛起伏、滚滚向前的世界历史长河之中欣赏或凭吊辉煌灿烂的人类文化的时候，将会发现这样一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中国人与西方人是两个心理结构截然不同的民族，这就是中国人保守、封闭，西方人豪迈、开放。也许人们还曾记得那位洋枪队长戈登说过的那句令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毋庸置疑，此语是在诬蔑、敌视心理促使下而作出的一种不尽全面的结论，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的心理特征。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经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①。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国人这种保守、封闭的心理结构？长期以来，很多人总是把它归结于中国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但这未免太肤浅、太刻板。诚然，一方面，华夏先民生活的黄河流域，土壤松软肥沃，草木丰盛，面积广袤，特别适宜于单一的农耕经济的发展。而这种自然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同时再加上生产和居住条件的稳定，就使得华夏先民往往不象世界其他游牧民族和商业航海民族那样迁徙不已、流动不止以及由此带来的频繁交往。这种经济特征反映到人们心理上必然呈现出一种保守、封闭、求同的内在心态。另一方面，就地理环境而言，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这个华夏先民生活圈以北，是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干旱草原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西伯利亚森林与寒原。在这个生活圈东部，则是更为严峻无情的茫茫东海。即就是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华夏先民后来进入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之后，也依然没有摆脱闭塞的地理环境：层浪迭起的金沙江、怒江，迤南丛林的烟瘴之地，陡峭险峻的横断山脉，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等残酷无情地横亘在古代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阻隔这两个文明之国的相互交往。对于远古先民来说，空间位置的距离足以使他们望而生畏。人们或许会骤然回想起，那些曾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漂流激荡的雅利安人、希腊人、突厥人、阿拉伯人以及波斯人等，都曾经轻而易举地来到过恒河平原这个印度文明的中心地带，并在印度民族文化中深深地打上自己民族习俗的印记。然而，他们只能站在喜马拉雅山脚下，面对终年积雪望洋兴叹，而没有也不可能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华夏先民的生活圈。

正是立足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理由，我们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对于造就中国人保守、封闭的心理结构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们的交相汇合在一定程度上窒息和扼制了中国人与外界交往的种种欲望。但是，这并不能说他们就是铸就中国人心理结构的唯一的或者说是根本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单就地理环境而言，在人类历史上，也有一些民族生活在比较闭塞的地理环境之中。比如埃及，它的北边濒临地中海，西边是占全国土地面积 $2/3$ 的撒哈拉大沙漠，东边是沙漠、高原、山脉（直接阻碍着内陆与红海的联系）。再如阿拉伯，它的西边是红海，东南部是阿拉伯海，南部有山脉，海拔在3000米以上。但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人为什么又是比较开放、豪迈的民族？更何况华

夏先民的生活圈也不完全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狭长的河西走廊、漫长的丝绸之路，总是毫不吝嗇地为古代中国与中亚各国提供着彼此交往的通道，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与知识正在和不断地征服着空间位置的障碍，中外文化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可是，奇怪的是，很多交流和获得新知识的机会，被人们当作邪恶而顽强地加以摒弃。中外文化交流的音响愈来愈低弱，中国人不断趋向和习惯于一种保守、封闭的心理状态。宋代以来的极度封闭、清代的锁国政策、“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力排外，早已是人们从中国历史中熟知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原因孕育了这些历史的怪胎？我们不妨把日光投视到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之学的儒家思想身上。

I

一种思想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通过其潜移默化的渗透方式，将要比其他法律手段或强权措施更能改变或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而尤其是当这种思想理论已被大多数人认同或接受的时候。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保守的思想家，他虽然生活在“礼崩乐坏”，早期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过渡，氏族统治体系和公社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相继瓦解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但他不是站在这个时代的前列为新制度的诞生大喊大叫，而是固守保守、落后的一面，哀叹世风不古，力图重建文武周公之业。他不仅在政治上主张维护周礼的统治秩序，而且在经济上主张维持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基于这种心理指向，孔子极力主张“从

周”、“复礼”，千方百计想让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重新倒退到文武周公之世，企图使新时代的人们重新奉行西周的礼仪制度，诸如“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旧不遗”、“故旧无大过，则不去也”、“贵贱不愆”等等，无不映示出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固然，孔子并非绝对局限于西周礼制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他也不反对对礼乐稍加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但是，保守的政治立场最终决定了在由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中保守的思想成分占有很大的比重。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曾经指出：儒家思想是保守的，它用古代规范限制了人们的理想^①。又说，儒学“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桎梏，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得人无法动弹，而造就一套永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束缚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动。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受到过分的拘束。……它使国家一味保守阻碍了进步。”^②千百年来，一代复一代，随着孔子被奉作“圣人”在人们心目中所占地位的步步升级和儒家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的节节胜利，儒学中那些“法先王”、“故旧皆好”的保守的思想成分深深地浸染着传统的中国人，在人们心理上打下无法泯灭的印

①[美]威尔·杜兰著、[台]幼狮翻译中心编译：《中国与远东》，1978年版，第216页。

②[美]威尔·杜兰著、[台]幼狮翻译中心编译：《中国与远东》，1978年版，第48页。

痕。正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各个朝代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正统派士大夫，面对社会矛盾，总是抱定一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毫不犹豫地在与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的剧烈搏斗和冲突中自我挣扎，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地盘。而我们知道，保守与封闭是互为因果的，一味地保守必然走向绝对的封闭。沐浴儒学教化的中国人，每每企图通过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方式，来保持对“祖宗之法”、“圣人之教”的绝对完美性的自我感觉。

另外，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在秦汉以后经历了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两次重要的改造，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①。经过这两次改造，一来儒家学说的保守性愈益增强，纲常礼教、伦理道德一套说教越发束缚着中国人的手脚，禁锢着人们思想火花的迸发。二来进一步强化了传统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抱着一种“天朝圣国”的信条，恪守忠孝节义、华夷观念、纲常礼教、敬天法祖等教条，总是以为儒家先圣贤哲缔造的礼乐教化具有博大精深的神化之机 and 超越时空的普遍威力，总是以为儒家的思想体系是人类社会中绝对合理完美和自我和谐的有机体系。相应，也总是以儒家的礼乐教化和纲常伦理的价值体系作为臧否一切的唯一尺度，总是以“尧舜周公孔孟之道”作为应付传统社会各类问题的独一无二的思想武器。从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到朱熹的“圣人之学”，“继天立极”^②，再从近代叶德辉的“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③，到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的孔孟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系以不敝者也”^④，都表明儒家思想具有超越一切时代和地域的永恒的普遍性和适应性。这种普遍性和适应性被传统的中国人一代复一代地认识与体验，久而久之凝聚为一种顽强的、僵化了的思维习惯，深深地积淀在他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并在深层意识中无形地左右着他们日常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因此，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凡是儒家经传中没有记载的东西，都一概指斥为“异端邪说”、“奇技淫巧”。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有关治国平天下的普遍原则不曾被儒家圣哲所发现，也没有任何新的普遍原则需要我们去发现，更没有必要借用什么外来的东西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这样一来，儒家学说这种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就变成为一个不自觉的自我封闭的排他性的结构。正由于这种结构的排他性，每当中国人与外来文化接触的时候，首先作出的就是对外来文化作整体性的拒斥反应，所有来自外来文化的信息冲击，都将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完美体系之外的谬误与杂质予以摒弃。这就进一步增强了传统的中国人自我保守、自我封闭的心理机制。

①董仲舒：《天人三策》。

②朱熹：《大学章句序》。

③叶德辉：《明教》。

④李元度：《国朝柔远记序》。

因此，我们说，如果说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使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趋向于保守、封闭的一面，那么，儒家思想则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保守、封闭的密码。

二、“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

——儒学与中国人保守、 封闭的心理结构

I

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十分清楚，儒学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时代的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这仅仅是立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就儒学与佛教、道教的比较而言。如果就各个朝代的具体情况来看，儒学的社会地位也是有升有降的。下面，让我们沿着儒学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沉浮的轨迹，考察它对铸就中国人保守、封闭的心理结构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就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比较而言，中国人保守、封闭，西方人豪迈、开放。这几乎是谁也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仅就中国人来看，唐以前的中国人，尤其是汉、唐人则又比较豪迈、开放，宋以后的中国人极其保守、封闭。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遥想汉人多少闷放，……唐人也还不算

弱。”^①的确，每当人们打开璀璨光华的汉唐史册，无不看到一个想象开阔而丰富、情感热烈而粗豪、风格浪漫而奔放的大千世界。先把我们的目光投视到汉代，你看那汉赋作者笔下巍峨的宫殿、气派的人物、惊险的狩猎、欢快的歌舞；你看那牛走马驰、鸟飞鱼跃、狮奔虎啸、凤舞龙潜的画象石；你看那奔虎攫拏、虬龙腾骧、朱鸟舒翼、白鹿孑蜺、五龙比翼的雕塑绘画；你看那霍去病墓前的一组石刻：前蹄腾起的跃马、仰首屈肢的卧马、魁伟健壮的牯牛、伸首张目的野猪、机警凶顽的伏虎等。再回首唐代，你看那昭陵石雕中神采飞扬、健壮雄伟的骏马，乾陵石雕中粗壮雄浑的石狮，李爽墓中双手握拳、昂首挺胸、足踏怪兽、远眺怒吼的陶天王俑，你看那诗人李白“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的狂放粗豪，你看那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高蹈胸怀；你看那孟浩然“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迈勇敢。所有这些，不都正是汉唐人开放、豪迈、热情、奔放这一时代精神的体现吗？！

为什么同是中国人，而汉唐人比较豪迈、开放呢？首先，我们说，这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大家知道，就汉唐两代而言，尽管也有经济衰微、民生凋弊、社会矛盾激化的危机时刻，但就中国历史长河来看，汉唐两代则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兴盛时期，发达的经济，强盛的国力，对外的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的安定统一，以及相对来说

^①鲁迅：《坟·看镜有感》。

的开明仕进、政平讼理、富裕风流、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使整个社会氤氲着一种恢宏豪迈、开朗奔放的精神气质。相应，一种从军杀敌、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积极进取、建立功名的激情弥漫在社会氛围之中，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汉唐文艺之中。正是这种时代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汉、唐人豪迈、开放的心理结构。

其次，汉唐人豪迈、开放与儒家思想在唐以前没有真正占据主导地位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如众所知，从春秋时代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起，儒家就作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学派建立起来。但由于它的政治态度和理论内容不能适应当时各国统治者的要求，因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政治生活中，儒学几乎是到处碰壁，就连孔子本人也栖栖惶惶，很不得意。尽管他不辞艰辛，先后周游齐、卫、宋、郑、陈、蔡、楚等国，但却未能为人采纳，以致诋毁他的人甚至说他是“累累如丧家之狗”。秦朝建立，崇尚法家。特别是秦始皇为了镇压不同政见，采取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焚书坑儒，更是尚未“长大成人”的儒学遭到一次致命打击。汉初崇尚黄老之学，儒学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定于一尊的局面开始形成。但是，应当指出，即使在武帝时代，也并非儒学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汉代统治者在把儒者变为“儒林”而提倡儒术的同时，还实行变法家为“酷吏”的政策。汉宣帝曾明白说